

訪問莊祖鯤牧師

引言：

今期的訪問跨越了一些界限，不再是香港和粵語背景的，而是台灣和美國背景的牧長。但沒有分別的是，每一位都關心炎黃子孫和中華文化。莊祖鯤牧師擁有亮麗的學業、事業和教內事工，可謂羨煞旁人；在互聯網載有他不少個人資料、且有他的真光協會可予讀者認識他，不用我在此再說一遍。然而，這次訪問是有別於此，因這是一個「事工性質」之上的身心靈訪問！

訪問者：徐濟時牧師(徐)

受訪者：莊祖鯤牧師(莊)

徐：很高興能在這裡向已達從心所欲之年的莊牧師，深入訪問。正如以往的人物專訪，都是一個全面性、全方位的訪問，好讓讀者對每一位有整全的認識。我們就按著生之序，先請莊牧師您談一下年幼至中學的成長歷程吧。

莊：我從小生長於一個「半基督教的家庭」，母親是虔誠的基督徒，她初中時期在宋尚節的佈道會中信主。父親卻是極端反基督教的人。但我祖父是虔誠的基督徒，將三個兒子分別取名為雅各、約翰和西門。但我父親幼年時因祖父家道中落，無力撫養兩個幼女，就將兩個女兒託一位泉州牧師將她們交給信主的家庭去收養。沒想到那位牧師卻將她們各以三塊大洋賣給不信主的家庭〔編者按：那動盪年代充斥混飯吃的假傳道人〕，以至於其中一位因受虐待導致營養不良而死。在這件事的刺激下，我父親和兩位伯伯都離開教會，父親也將原名「西門」去掉「門」字。從此要向我父親傳福音，可以說「門都沒有」！但是感謝神！在 1970 年我當兵的那一年聖誕節，我父親忽然主動表示要受洗。這是神所給我們全家最大的聖誕禮物，使我們全家歸主的最後一塊拼圖完整了！這完全是神自己的作為，為此我們都非常感恩。

我自小就隨母親去教會，但是由於心不在焉，所以迄今我對高中以前去教會一事，毫無印象。由於我個子矮小，從小學到中學，我的座位幾乎都是 1 號，因此也就在「識時務者為俊傑」的心態下，循規蹈矩，從未打架鬧事，專心學習。我中學成績不錯，高中畢業以全校第六名的成績，保送台灣大學化工系—那是我 14 歲「高瞻遠矚」就立下的志願！

我信主是在高中畢業後的那個暑假。當時我二哥雖尚未信主，卻報名了大專夏令會，然而又臨時改變心意不去了，我就「冒名頂替」越級參加了夏令會，也因此替他信了主！其實在這之前，我已經有六個月的時間在信仰上探索，要確定是否「天外有天」，也經歷到神回應我的禱告。但是在營會中，我才真正認識並且接受耶穌基督為我個人的救主及生命的主宰。從此我的人生就「換老闆」了！

大學的四年是我信仰的啟蒙階段，也是我最快樂的時光。在校園團契中，許多學長的生命見證都成為我們效法的屬靈典範。也因此，我就與校園福音工作結下不解之緣，數十年來一直對學生工作有負擔。

徐：您以優異的成績入讀台大化學工程，後再到美國名校西北大學讀取化工博士，返回台灣迅速上位至業界的領導，前途無限。那一段為世間事業打拼的日子，帶來怎樣的人生光景呢？

莊：我「蒙召」帶職事奉了二十年。我大學畢業後，並沒有隨著當年的留學潮立刻赴美，反而在台灣工廠工作了七年之久。這一點曾讓我父親非常不高興。但是在工廠的那幾年，讓我接觸到社會基層的員工，深刻理解「江湖險惡」真實的一面，也讓我更接地氣。我是大學畢業九年後，31 歲時才到美國讀碩士和博士的，是當年西北大學年紀最大的學生之一。

當我 1983 年拿到博士之後，就立刻回台灣工作，又讓剛拿到綠卡移民到美國的父親頗不釋懷。我回台灣時，神沒有照我的原定計劃帶我去南部的高雄—那裡有我熱愛的教會，反而帶我去了新竹—台灣的科技城，在工業技術研究院工作了七年。但最初的那段時間，說實在的，我是有點茫然的。因為邀請我回國的研究所長忙得沒空安排我工作，以至於我游手好閒了三個月之久。於是我就將研究所成立三十多年來所有的研究報告都讀了一遍，並與所有的研究人員都聊過天，甚至去了幾家公司介紹我們研究所的研究成果。當所長終於有機會和我談工作的問題時，他知道我那三個月所做的事，也覺察我們研究所一直在「閉門造車」，就決定立刻成立一個新的研究組(Division)，讓我擔任組長(Director)，去推介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後來幾年我又轉到不同的研究組擔任組長，最後四年多我擔任最大的一個研究組組長，那個組裡有三十多位博士，七十多位碩士，號稱「天下第一幫」。所以我就有了一個「丐幫幫主」的綽號！

徐：您從童年成長至事業有成的前半生過程中，宗教信仰處於怎樣狀況？身處上述的「成功人生」，有否什麼有血有肉的掙扎？您如何為更高理想甘心放棄？

莊：從我信主的那一天開始，我就將我自己的人生藍圖交給神了。因此，我沒有立刻出國留學，與後來走上全職事奉之路，都不在我原先的生涯規劃之中。但是當我帶職事奉時，無論在職場或教會，我都希望自己能活出基督。在職場上，所有的同事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也曾在公開場合表明希望為人處世都採取基督徒的原則。但是我避免在上班時間向同事傳福音，以免我作為他們的上司，讓他們心裡有壓力。然而有一次當一位部屬要離職赴美留學時，在蓋完最後一個離職戳章後，卻要求我向他說明基督教的信仰要旨，因為他在我身上看到不同的領導風格。我當然樂於從命！

我讀完化工博士回台灣是為了神的呼召。出國前我對台灣的教會光景頗感憂心，所以希望自己是向尼希米傳遞異象的哈拿尼（尼 1:2），能呼召一些留學生回台灣服事。因此，我在美國留學

期間非常關注華人查經班以及美國福音派教會的情況，也是我第一次知道甚麼是「解經講道」。

我回台灣時，在新竹剛成立的跨教會職青團契（佳音團契）擔任輔導，其中多數是在科技界服務的青年。我們非常注重查經及門徒訓練，佳音團契也從不到十人成長至一百多人，後來更出了不少傳道人。感謝主！所以在新竹的七年中，無論是在教會或佳音團契的事奉，都讓我們覺得如魚得水。

但是在帶職事奉的過程中，一方面對自己在傳福音和教導上的恩賜與負擔越來越清晰，也逐漸知道自己早晚會「蒙主寵召」，走上全職事奉之路。另一方面，我也在衡量自己人生的「投資報酬率」。在工作領域中固然有成就感，也能榮神益人；但是在傳福音時，看見有人的生命被神所翻轉，使憂傷的心轉為喜樂、仇恨轉為愛，覺得那是更有價值的事。所以我人生的天秤就逐漸更傾向全職事奉去了，我所等候的，就是那一個呼召(Wake up call)。而 34 年前廣場上的槍聲，就是我等候已久的那個 calling。

對於八九風波，我既不是民運份子，也不是當年民主運動的熱切支持者。相反的，我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一方面被當年廣場上的青年們在為自己及國家的前途找出路的熱誠所感動，但是又覺得他們找錯了「藥方」。民主政治不是萬靈丹，不能解決貪腐與濫權的問題，如今多數極權國家也懂得玩民主政治的把戲。社會真正的病因是道德滑落，而這個問題的解決之道乃是信仰問題。所以神對我的呼召，乃是以福音的真理來轉化中華民族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

徐：您人到中年到美國讀神學，您為何讀博士選「跨文化研究」？這在當時有沒有什麼特別原因？此外，受訓的全程經歷怎樣的挑戰？這一段讀神學的日子，妻子和孩子亦面對挑戰吧？可否也分享一下？

莊：是的，我 42 歲才開始讀神學，比一般神學生晚。我最初對於神學院的情況不太了解，所以想先讀一個最簡單的碩士學位看看，就選了一個必修科目最少的宗教碩士(MA in Religion)。但在神學院的第一年我就了解，我想學的福音與佈道相關的課程，都在宣教系（也就是「跨文化研究」）。雖然當時我對於將來是要牧會或教神學尚未確定，可是為了將來可進可退，我就決定繼續讀博士學位。

我是 1989 年蒙召，1990 年去芝加哥三一神學院讀神學。但是我妻子卻是在 1980 年就蒙召了，所以她等了我 10 年之久，當然極力贊成我讀神學！其實自從我們結婚，她就一直在為我的全職事奉禱告。換句話說，她早就把我「奉獻」給神了。因為考慮到學費的問題，她原本只想作「陪讀」，沒有自己也讀神學的打算。沒想到一位教會的姊妹知道我要赴美讀神學，就拉著她到銀行，將她讀神學幾年所需的費用，一筆就轉到我們的帳戶中。這是神給她的印證，所以她也讀了宗教碩士的學位。

至於我的兩位女兒，我和她們表明：將來她們如果讀大學，昂貴的學費可別指望我這個「地上的老爸」，只有仰望「天上的老爸」了！我的大女兒回應說：「事奉之路是全家一起走的，不是你一個人的決定而已。」感謝神！後來當她們先後讀大學時，神都為她們預備了全額獎學金。所以我們全家都經歷到神是信實而且滿有恩典的！我大女兒自哈佛教育學院碩士畢業後，在波士頓的高中教了九年書，然後加入波士頓的以馬內利福音中心(Emmanuel Gospel Center)，如今全時間從事都市宣教的事奉已經十多年了。

徐：您畢業後怎樣走到波士頓牧養華人教會？牧會的日子怎樣面對區內名校高材生的需要？在這些精英分子中牧會有何體會？面對哈佛 MIT 那一類學生或畢業生，傳福音、作栽培或與之同工，有否什麼大挑戰？

莊：其實依我的個性及過去帶職事奉的經歷，擔任牧會工作應該是最後的選項，我可能更喜歡作不受拘束又快樂的巡迴佈道家，或到神學院教書。但是後來我領悟到：若自己沒有牧會的經歷，又怎能教學生去牧會呢？何況只有在牧會過程中，自己才能切身體驗到「道成肉身」的意義。所以牧會固然有酸甜苦辣諸般滋味，卻是塑造屬靈生命的最佳「道場」！

在選擇牧會工場時，我在台灣的母會—新竹勝利堂—對我們發出邀請，那裡有合作多年的屬靈夥伴，因此應該是最理想的選擇。但我是因六四的事件蒙召的，而我的博士論文—〈如何向北美的中國知識分子傳福音〉—也是針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所以一路走來，神給我的負擔和引導很清楚，就是要向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傳福音。既然如此，我就婉拒了台灣的邀請，而去了知識分子雲集的波士頓。

面對哈佛、MIT 高材生或專業人士的慕道友和信徒，對我而言，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壓力或挑戰，因為我自己就是出自高科技的背景。比較大的挑戰反而是來自於教會的領袖。華人教會的長執們很多同時也是公司的高管，他們往往不加思索地要將世俗公司的那一套管理制度和觀念應用在教會的治理上。所以有些教會的長執們常常自視為董事會(Board)的成員，而將牧師看為受聘的總經理(CEO)，可以隨意任免。這種通病是北美華人教會常有紛爭的原因之一。

我自己曾擔任過高管，也受過不少的企業管理訓練，對於職場上的那些管理觀念非常熟悉。但是我的神學訓練及在教會多年的事奉，讓我有屬靈的分辨力及透視，也使我對於這些似是而非的管理理念的缺點深有體會，可以避免陷入誤區。但是要與這些科技高管背景的長執們溝通，才是真正的挑戰。

徐：您之後成立真光協會和轉往真理堂牧會，背後是否有一些特別原因？不少人五十歲開始就計劃退休，但見您和師母反而不斷加強事奉(牧會、出外領會、製作教材)，而且寫了不少書(書種亦不同，可否簡單介紹一下?)我體驗到這樣事奉甚為艱辛，到底背後有什麼異象和負擔

在推動著您們？

莊：我自 1995 年至 2002 年在波士頓聖經教會牧養了七年，教會人數增加了一倍。中文堂由 350 人增加至 680 人，英文堂由 120 人增加至 270 人，全教會人數（連兒童及青少年）由約 650 人增加至超過 1300 人。但是由於我是學宣教的，我的負擔是佈道，而牧養這樣一間大型教會卻讓我分身乏術。我每年只能外出講道五次（這是教會的規定），所以牧會七年期間我未曾去中國，偶而去外地帶領福音營。我覺得到了一個階段，我就得換個事奉的型態，以免受局限。因此，2002 年我辭去了聖經教會的牧會工作，轉為「自由傳道」，也就是只要有需要，我們可以到任何教會、任何地方、任何方式服事神。所以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和師母再也沒有領過「固定薪水」，而是憑信心仰望主！2002 年波士頓有一群弟兄姊妹成立了「真理堂」，並邀請我們夫婦來牧養他們，經過禱告，我們接受他們的邀請。但是彼此有三個君子協定：1. 我們不領固定薪資，但是同意接受教會提供的醫療保險，及相當於講員費的「禮金」；2. 我們以「夫妻檔」的方式共同牧會(co-pastoring)，我不在時由師母講道，不至於使教會「沒爹沒娘」；3. 我會有一半的時間去外地事奉（教神學或領聚會），時程由我自己決定，不需要教會的認可。

因此，自 2002 年迄今，我去了中國二、三十次，在亞洲、歐洲及南美洲教神學或領聚會數十次。同時我和師母所寫的書，除了一本之外，也都是在 2002 年以後才寫的。師母寫的研經叢書，都是她帶小組查經的筆記，因此都是以 Q&A 的方式寫的，與一般的註釋書不同。同時，她在寫的時候，都參考了當代最受推崇的著名註釋書，所以既有深度又兼具實用性。目前她一共出版了七本，包括《馬太福音》、《馬可福音》、《約翰福音》、《使徒行傳》、《羅馬書》、《加拉太書》及《希伯來書》。

我在 2004 年先寫了《宣教歷史》、《宣教神學》及《宣教與文化》三本宣教叢書，後來又寫了《說禪論道》(2009)及《迴別》(2013)。其中後兩本書及《宣教與文化》也在中國正式出版，只是《宣教與文化》改名為《契合與轉化》。近幾年為了神學課程的需要，又分別出版了《大哉問—護教學概論》(2019)、《真道辯—論異端、別異教派與異教》(2020)，及《天啟義路—基督教倫理學概論》(2021)。這三本書是將我收集了三、四十年的資料所匯集而成的，也是我壓箱底的「武林秘笈」。2023 年開始，我準備將我將近二十年前出版的三本宣教叢書更新再版，目前已經完成的是《宣教神學》，內容增加了一倍，將於 2023 年出版。之後也將在 2024 年推出另外兩本。這宣教三部曲可能是我最後的壓軸之作了。

除了書籍之外，我們也將歷年來的解經講道匯集成 CD，供有心學習的人選購，但是也有網站可以免費下載。我們是逐卷、逐章地按著嚴謹的解經原則來講，二十多年來，我們已經講了新舊約聖經的五十幾卷書。我們的負擔是因為我們看見教會有屬靈的「饑荒」—就是沒有神的話（摩 8:11）！所以我們願意效法保羅的榜樣，正如他自己所作的見證：「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

天上來的異象，……」因此期望在有生之年，能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徐：您是理工科出身且從事這行業多年，竟然選上文化研究融入下半生事奉；您寫了幾本與異文化會通的護教書籍，這與大多出身工商理科的華人神學工作者的寫作很不同。可否從過來人身份，在這方面解說一下？

莊：我是理工科的背景，信主前對於文史哲方面的書很少涉獵。但是當我信主後讀大學時好像才「開竅」了，特別對這方面的知識及書籍感興趣。大學期間不但博覽群書，而且也去旁聽了一些中國文化史、中國美術史等類的課。但是由於根基淺薄，囫圇吞棗的結果不但消化不良，甚至會誤食「毒草」（如尼采的書），使我的信仰搖搖欲墜。然而感謝神的保守，我才沒有誤入歧途。

我為了與福音朋友傳福音，就得「向甚麼人作甚麼人」，必須了解他們的觀念與思想。這是我涉獵各種書籍的初衷。所以當我大學畢業二十年後開始讀神學時，並不會因為我的理工背景而感到棘手。事實上，我認為基督徒若要傳福音，就得準備「搭橋」。因此我們不但要對「此岸」—我們的信仰—很熟悉，也應該對「彼岸」—慕道朋友的觀念與想法有所了解。在這個動機下，我不斷地反覆思索如何適當地回答他們的問題，也收集了不少資料。這些材料在我這幾年出版《大哉問》等三本書時派上了用場。

但是當我撰寫《說禪論道—基督教與儒、釋、道的對話》時，卻有意地避免從學術的立場來討論，而以通俗的話題與語氣來從事宗教對話。我的目的是與那些有中國傳統文化背景的福音朋友，在不尖銳對立的氣氛下，透過對話讓他們發現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乃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的。這是利瑪竇的「合儒→補儒→超儒」策略之應用。我也期盼有更多的基督徒能參與在這種對話之中。

徐：您幾年前出版的《基督教傳播史》，我已選作教會史的教科書，因為覺得以福音傳揚的「神國史」講教會史，更有意義！其中第六章您特別講到東方教會這個一般教會史欠缺的課題（實與景教有關而非常重要），十分之好！您認為我們讀教會史是否應改一下取向、不照跟西方的一套？

莊：其實今天有很多的教會歷史學者都發現了這個「缺環」，而開始關注東方教會發展史。尤其當 21 世紀教會重心開始「南移」，也就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教會在蓬勃發展時，這種「尋根式」的探索更顯得重要。但是我們並非要抹殺西方教會在宣教上的貢獻，因為這是神普世宣教大計的戰略。但是東方教會傳播過程中的興衰與成敗，卻是我們需要特別關注的。

例如涅斯多流派（唐朝稱為「景教」）宣教士披荊斬棘的宣教熱誠固然是令人感佩的，他們在中國及蒙古人當中的宣教成果也是不容抹殺的。然而同樣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今天他們卻沒有留下長存的果子。我們必須從歷史中學教訓，這就是「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的道理。

西方宣教歷史當中也有許多寶貴的經驗可以作為借鏡，許多「道成肉身」的宣教士足為表率。然而西方宣教歷史中也還有許多「無名的傳道者」（特別是亞洲和非洲本土的傳道人），他們的事蹟與貢獻被埋沒了，這是目前許多教會歷史學者想要去發掘的。此外，西方宣教歷史當中也有許多被證實為弊大於利的策略—如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丁美洲所使用的「十字架與劍」手段，及十九世紀西方殖民國家所使用的 3C 政策（基督教、文明與貿易）—都是應當摒棄的。

徐：兩岸的學人和精英界顯然都是您關懷的，在目前這般複雜、敏感的中美台三方走向戰爭困局，您有否一些從信仰看到的出路？華人教會應迴避或扮演什麼角色？

莊：這可能是一個最敏感的問題，也可能在中國境外（包括港台）的中國教會中會發生爭議。如 2020 年美國大選中，有些美國的華人教會就因為信徒支持或反對川普（或譯特朗普）而彼此對立。這幾年香港國安法使許多香港基督徒移居海外，台海戰雲密布也是五十年來所僅見的。這都是教會牧者感到棘手的問題，但是又無法避免的話題。所以牧者應該知道如何去應對，而不是以鴛鴦政策來逃避。

首先，在和與戰的議題上，教會既沒有能力去影響政局的發展，也沒有明確的立場和聖經基礎來支持任何一種觀點，所以應該避免用「基督徒應該如何、如何……」的絕對口氣來申述自己的立場。正如基督徒對於核能、石化燃料、打疫苗等問題，也不應該祭出旗幟鮮明的所謂「基督徒觀點」。

其次，關於「戰爭與和平」的議題基督徒也不都是立場一致的。固然有不少基督徒是和平主義者，卻並不代表是多數基督徒的觀點。至於發動戰爭的時機與理由，以及戰爭的手段也都大有商榷的餘地。有興趣要深入探討的人，可以參考我的《天啟義路》一書中關於戰爭與和平的討論。

再者，基督徒必須了解，民族主義與天國倫理是不相合的，因為天國裡的人沒有人拿任何國旗。先知約拿就是基於以色列人的民族主義情懷，拒絕去敵國亞述首都傳福音；法利賽人也因為狹隘的種族主義，而拒絕讓神的救贖計劃應用在外邦人身上。而歷代最慘無人道的屠殺或戰

爭，都是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一如納粹德國就是一例。基督徒更要分辨，以免像當年德國基督徒一樣，他們盲目地隨從納粹黨的宣傳而為虎作倀，成為種族屠殺的共犯。

最後，我也反對無限制的軍備競賽。作為一個出生於台灣的基督徒，我認為多帶領一些同胞信主，比買更多反導彈的飛彈，更能帶給台灣安全的保障！

徐：你今後的事奉還有什麼計劃呢？你有否打算怎樣退休？

莊：我因為是屬於「自由傳道」(self-employed)的身分，所以沒有退休計劃，但是 2022 年底我的身體出現一些的狀況，初期的現象是膽管阻塞，外科醫生建議做一個「十二指腸胰腺切除術」(Whipple Procedure)。手術後，我目前可以用「肝腸寸斷、九死一生」來形容。因為我開刀切除了十二指腸、膽囊、部分胰臟及膽管，所以是「肝腸寸斷」。最後診斷是「膽管癌」。據醫學統計，由於九成的病患都是在晚期才發現的，所以這種病的復發率及死亡率都很高—五年之內死亡率高達 90%！也就是「九死一生」。雖然我的膽管癌可能是早期的，癌症科醫生還是建議我做「預防性化療」。但是這種實驗性化療的療效只有 25%，雖然副作用還不算太強，但是難免會延緩我身體的恢復（因為要由小腸代替十二指腸的功用）。

因此我和師母經過禱告，決定不做化療，因為與其 25%靠化療，75%靠禱告，還不如 100%仰望主！我們有神話語賜下的應許，以及醫療過程中看見神的恩手一路在保守，所以心裡很平安。我們決定以「喜樂的心乃是良藥」（箴 17:22）來面對，每天學習「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帖前 5:16-18）。

目前我的精力已經恢復了 95%以上，四月底就開始「重出江湖」外出事奉了！然而因為我身體的狀況，所以我現在每次只作三年短期計劃。若神許可，之後我就再做一個接著一個的三年計劃。我願意效法保羅所說的：「我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徒 20:24）阿們！